

科學界動態

批判胡適反動思想的戰鬥進一步展開

1954年12月至1955年1月，批判胡適反動思想的戰鬥正在逐步展開。

到1月中旬為止，在人民日報、學習、光明日報、新建設、文藝報及其他報刊上發表的批判胡適的反動哲學思想、政治思想、文學觀點、歷史觀點的論文已有40篇左右。學習雜誌1955年1月號發表了以“展開對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思想的批判”為題的評論，在評論中說明了批判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思想的巨大意義，並指出：反對胡適派唯心論的思想鬥爭的目的“就是要從學術文化界進一步掃除資產階級思想和帝國主義思想的影響，就是要通過這種鬥爭進一步地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思想教育廣大人民羣衆，並且在許多學術部門內加強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領導力量。”

按照中國科學院、中國作家協會聯合召開胡適思想批判討論會的預定計劃，在1954年12月到1955年1月中旬，“胡適哲學思想批判”組與“紅樓夢的人民性和藝術成就”組都正式開展了專題的討論。

1954年12月29日和1955年1月7日，“胡適哲學思想批判”組對艾思奇的“批判胡適的實用主義”一文（見“學習”1955年1月號）進行了兩個下午的熱烈討論。會議由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和社會科學部副主任潘梓年主持。

艾思奇在論文中首先指出：實用主義是美國資產階級的反動的哲學思想，是帝國主義時期資產階級最腐朽的主觀唯心論的一個流派。胡適在“五四”運動期間把實用主義販賣到中國來，目的是用來對抗辯證唯物論。

艾思奇接着揭露實用主義對“實在”和“經驗”的主觀唯心論的解釋。他指出：實用主義者把“實在”看做由人的感覺要素所構成，認為“實在還正在製造之中”，“實在是一個很服從的女子，他

百依百順的由我們替他塗抹起來”，從而否定了客觀存在的物質。實用主義者企圖用經驗做幌子，以調和唯物唯心問題的姿態，來宣傳主觀唯心論。

在認識論和真理論一節中，艾思奇敘述了辯證唯物主義對“認識”、“真理”的正確理解，批判了實用主義者以“效用”作為真理的標準並企圖由此否定真理的客觀標準的卑鄙的謬論。

艾思奇對“實驗主義的方法”作了細緻的分析批判。他指出：胡適的所謂“細心搜求事實”，實際上就是要大家去搜求枝枝節節的表面的事實，一個一個偶然觸及的問題，避免觸及客觀事物發展過程中的根本性質的問題。胡適所謂的“大胆的提出假設”，把“大胆”作為從事“假設”的主要原則，否定了假設是要建築在足夠事實材料的基礎之上，從而使“假設”變成了純粹的“主觀的虛構”。至於胡適的所謂“再細心求實證”，實際上只是承認某些個別的表面現象，而對人類社會的根本事實——生產鬥爭和階級鬥爭的現實，則拒之於千里之外，胡適就這樣用某些個別事實的真實證據，把自己的研究帶上科學的假面具，然後在重大的問題上，在一些根本的問題上，特別是在政治問題上，十分“大胆”，十分放肆，以至十分無恥地做出種種明目張胆地為帝國主義和國內反動派服務的荒謬假設，並隨心所欲地胡亂地拉些個別的事實來加以“證實”。

最後，艾思奇揭露了實用主義的庸俗進化論的反動本質，指出胡適企圖用“世界是一點一滴一分一毫的長成的”庸俗進化的觀點，來否認事物由量變進到質變，否認社會的革命發展，以此來對抗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學說。

在討論中，有胡繩、馬特、金岳霖等十餘人發言。發言者一致認為艾思奇對胡適的實用主義思想作了較全面的批判，特別是對“實驗主義的

方法”分析得比較深入具體。同時也指出了艾思奇的論文的主要缺點，並對胡適實用主義思想的批判作了一些重要的補充和修正。

首先，許多發言者認為，艾思奇的論文在若干問題上沒有劃清馬克思列寧主義與實用主義的界限，沒有充分闡明馬克思列寧主義與實用主義的根本對立。例如，在關於“實在”和“經驗”一節中，沒有明確地說明馬克思主義對“經驗”的理解，因而不能給人以一個清楚的概念。在認識論和真理論一節中，沒有揭露唯心論者在認識論上的最根本的反動觀點——不可知論，因而使整篇文章缺乏一個明確的中心。此外，艾思奇對這一節中的“實踐”與“交涉”、“實踐活動”和“客觀的物質現實”、“實踐”與“感覺經驗”、“真理”與“謬誤”等基本概念的闡明上，存在着原則性的缺點或錯誤，有的甚至也沒有和實用主義明確地劃清界限。在“實驗主義方法”一節內，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論介紹得也不够嚴格完整。正是由於這些缺點，就使得這篇論文不能最有效地打擊敵人，教育人民羣衆。

其次，發言者又指出：唯心主義者是十分狡詐的，他們爲了掩蓋自己的荒謬論點，總是給自己的論點加上層層偽裝，來欺騙、蒙蔽羣衆。實用主義在這方面表現得尤爲突出。因此，在批判實用主義時，我們不應該糾纏在一些實用主義的虛飾的論調上面，而應當深入地揭露它的本質。而在這方面，艾思奇也是做得不够的，甚至在個別地方還爲胡適的表面文章所欺瞞。例如在批判胡適的自然主義人生觀時，說其中有幾句話“是帶有真正唯物論的和真正科學的氣味的”。事實上，胡適的自然主義人生觀否認社會階級的存在，否認階級對人類思想、道德的影響，是直接和唯物史觀相對抗的，根本沒有絲毫的唯物論的氣味。

第三，有的發言者指出，庸俗進化論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產生後才出現的，它是以對抗辯證唯物論爲使命的反動哲學，是胡適的世界觀的重要組成部分，應該作爲重點來批判。同時，艾思奇在批判實驗主義方法時也沒有聯系到胡適的反動世界觀，這說明文章在邏輯上也還有改進的必要。

在討論會結束時，郭沫若院長發表了三點重要意見：第一，要求大家站在馬克思主義立場上來保衛科學，不讓唯心論來歪曲近代科學成果，

將科學引入歧途。第二，要求大家站在馬克思主義立場上來揭露實用主義的物質基礎，用階級分析的方法揭露實用主義的階級本質。第三，要求哲學家的論文寫得更通俗一些，以便收到更大的宣傳教育的效果。

1月14日，“胡適哲學思想批判”組又對胡繩的“論胡適派腐朽的資產階級人生觀”（刊載於1955年1月7日的人民日報）進行了討論。會議由艾思奇主持。

胡繩在論文中首先指出了胡適是在舊中國的思想市場上向羣衆進行欺騙和麻醉，販運最反動、最腐朽的資產階級人生觀的一個人。他的腐朽惡毒的人生觀是從完全反動的、反科學的世界觀和歷史觀引導出來的。

論文指出：“胡適在中國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革命運動不斷高漲的時期，出來聲嘶力竭地宣傳個人主義，其目的在腐蝕中國人民大衆的思想，破壞他們通過鬥爭而鍛鍊起來的集體主義精神，其目的又特別是在腐蝕知識分子的思想，阻止他們去和工農羣衆相結合。”在這一節的末了，胡繩更着重地指出：在我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過程中，聽任這種個人主義人生觀的發展，就是破壞社會主義事業，破壞祖國的利益，也就是破壞了勞動人民的利益。因此，在今天，反對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的鬥爭具有極爲重要的意義。

在第二節中，胡繩對胡適的自然主義人生觀作了深刻的分析批判。論文指出：胡適提倡自然主義人生觀的主要任務是否認社會歷史發展的規律，在社會觀、歷史觀方面給唯心主義敞開大門。在胡適的“自然主義人生觀”中，至少有四條是直接以混同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爲目的的，主張用生物學和資產階級的唯心主義的社會學知識來解釋種種社會現象，從而達到否認和蒙蔽社會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的目的。

在最後一節中，胡繩揭露了胡適的自然主義人生觀中的所謂“社會不朽論”的反動本質，指出胡適企圖以所謂“善也不朽，惡也不朽”，“大我不朽”來否認社會的階級本質，從而得出資本主義制度永生的結論。同時也有力地論證了胡適對偶然性的崇拜和叫囂，所謂“一點一滴的改良”正是代表了沒落反動階級的思想，因爲，沒落的反

動階級在決定他們死亡的客觀的規律面前，只能妄想依靠偶然性來實現自己的目的，妄想用“一點一滴”的努力來改變自己的命運。

在討論會上，有十多位同志發言，大家一致認為胡繩的論文以階級分析的方法對胡適的資產階級的腐朽的人生觀作了深刻的分析批判，是一篇具有巨大教育意義和高度戰鬥性的文件。如馮友蘭、賀麟等都以親身的體會來說明這篇文章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有巨大幫助。

同時，發言者也指出了這篇文章的一些缺點，並作了一些補充。發言者認為這篇文章沒有充分地闡明胡適的腐朽人生觀與其反動的世界觀、歷史觀的聯繫，沒有充分闡明個人主義人生觀的社會根源，對於胡適的腐朽人生觀對人民革命事業的實際危害也揭發得不够，同時也沒有和胡適本人實際的政治社會活動密切聯繫起來。這篇文章的另一缺點是在批判個人主義人生觀的同時，沒有全面地闡明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集體主義的人生觀，因而使得讀者不能從這篇文章中受到更多的必要的正面教育。對於這個問題，潘梓年作了重要的補充。還有同志提出胡繩的論文對胡適思想的反愛國主義的性質也強調不够。

1954年12月29日、1955年1月9日和1月15日，“紅樓夢的人民性和藝術成就”組也召開了

三次討論會，討論會憲凱的“紅樓夢產生的社會背景和它的傾向性”。會議由中國作家協會主席茅盾主持。在討論中，尙鉞首先作了長篇發言，詳細地論證紅樓夢所處的社會背景。以後大家對這個問題着重地進行了討論，鄧拓在最後作了比較全面的發言。絕大多數發言人都同意當時的中國是處在封建社會開始分解、從封建經濟體系內部生長起來的資本主義經濟因素正在萌芽的時期。紅樓夢作者的反封建、追求個性解放的思想傾向，是受了當時反映着萌芽狀態中的資本主義關係的發生和發展的新興市民思想的影響。但是仍有少數人對當時是不是資本主義萌芽時期表示懷疑。而在承認有資本主義萌芽的人中，對當時資本主義因素發展的程度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通過這些專題的討論，到會者都感到得益很大。有許多自然科學家對批判胡適思想很關心，積極地參加了討論會。

根據預定計劃，“胡適的哲學史觀點的批判”組擬在1月20日舉行討論會，討論馮友蘭的“哲學史和政治”一文；“胡適的政治思想批判”組在1月21日舉行討論會，討論侯外廬的“論胡適四十年來一貫反動的政治思想”一文。

（范岱年）

關於我國過渡時期的經濟法則問題的討論

自從1953年新建設雜誌第10期發表王學文的“中國新民主主義的幾個經濟法則”以及1954年學習雜誌第4期發表蘇星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法則在我國過渡時期的作用問題”和第7期王學文的“關於我國過渡時期的經濟法則問題”之後，關於我國過渡時期的經濟法則問題的討論，引起了我國學術界的普遍注意。參加討論的人，有從事學術研究工作和宣傳教育工作者，有從事經濟工作以及其他各部門工作者，到1955年1月28日為止，單就學習雜誌收到這方面討論的文章就有160篇。這次討論充分說明了我國社會主義經

濟建設的實踐，迫切需要從理論上解決我國過渡時期各種經濟問題，同時也表明了我國經濟工作者以及廣大幹部已經開始把斯大林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中所闡明的理論，結合我國過渡時期現實的經濟情況加以研究。這一討論的繼續正確進行，不僅將使我國經濟工作者以及廣大幹部的思想水平提高一步，也將為今後經濟理論研究工作打下良好基礎，並從而推動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事業的迅速進展。

在這次討論中提出的問題很多，牽涉的範圍也很廣泛。所討論的主要問題是社會主義基本經